

培根四种幻象说及其对心理学研究的意义

王 波^{*}

〔摘 要〕 弗朗西斯·培根指出了存在于人类之中的四种幻象,亦即种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场幻象和剧场幻象。它们是人内心倾向于无知和谬误的偏见,是获得真知的重大障碍。我们发现这四种幻象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仍然存在一定影响。培根被称作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其四种幻象说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为以科学自居的现代心理学改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高其科学性提供了有益镜鉴。

〔关键词〕 培根;四种幻象;方法论;中介性;理论心理学

自心理学诞生以来,关于这一学科科学性的反思和争论(Berezow, 2012)便一直延续至今。这种争论的核心问题质言之乃是心理学知识的边界问题,亦即关于心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与界限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出于一种边界意识,省思心理学知识的特殊性质。它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纯粹客观的、似乎不可逆转的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实际上,正如晚近的认识论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在根本上都是有局限的,它并不是一面天真的、忠实的和可以被直接给予的“自然之镜”。相反,只有在经历了层层中介之后知识才能出场。在科学研究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了这种中介性的人就是弗朗西斯·培根。1620年,培根在其《新工具》一书中,首次完整地揭示了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关键中介,亦即存在于人内心的倾向于无知和谬误的四种幻象:种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场幻象和剧场幻象。“劫持着人类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不仅围困着人们的心灵以致真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即在得到门径以后,它们也还要在科学刚刚更新之际聚拢一起来搅扰我们。”(培根,1984,第18—19页)培根的这种努力开创了西方思想史上至为重要的理性批判传统,深刻地塑造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各个新兴科学的发展。通过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区分现象界和物自体,康德(2004)接过了培根的问题式。我们只能认识现象界,因为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它已经经历了时空的直观形式和十二范畴的中介。知识就是通过这种心灵铸模才得以可能的。而马克思则将康德那里组织知识的时空直观形式发展成了历史的时间和地理的空间(王波,2011,第113页)。而福柯(2001)基于认识型所作的知识考古学的现实基础必定就是马克思所谓对象性活动的历史和地理变化。经过库恩(2003)范式论的锻造,追逐关于表象的可测

^{*} 哲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210023。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心理学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4CZX003)的阶段性成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曹富涛参与了资料收集与整理,特此致谢。

性与普适性的规律的传统心理学更无法理解科学如何从用非历史的表象性语言描述真理演变成时间性的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的协商与互动的语言学。表象性的真理现在成了历史性生成的人与自然彼此建构的阐释性操作关系 (Pickering, 1995)。故而理解培根的幻象理论对根本把握心理学学科及其知识生产的真正性质,更深入有效地开展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直面经验知识生产中的层层中介,作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 (马克思, 1958, 第163页) 的培根,为我们指明了通向科学心理学的正确道路:勘破四种幻象的迷雾才能击破认知障碍,获取真正的知识。

一、种族幻象

所谓种族幻象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与生俱来的一种弱点,是人脑进行信息处理和认知建构方式的必然结果 (Dror & Fraser-Mackenzie, 2009, p.53)。这种普遍错误的根源在于人们将感觉错认为一切事物的标准 (杜兰, 1980)。培根认为把人的感觉作为事物的尺度,乃是一种错误的论断 (Bacon, 1863, p.1)。如果人的一切感知都以个人的,而非宇宙的尺度为依据,则对事物的观察和理解就很难保持客观和准确,而是夹杂着个人主观的体验和感觉。

人脑知觉的组织原则使我们在面对模糊和缺失性的信息时依旧可以得出结论 (Dror, 2009, p.96)。这些原则在提高信息处理的便捷性的同时,也倾向导致一种与物理环境大相径庭的知觉或心理环境,由此就产生了错觉或感觉的欺骗。感觉所获得的信息在进入人脑的那一刻就已然发生了扭曲。坚持以感觉经验作为事物的评判标准,停留在感觉直观的层次,必会落入到种族幻象的陷阱之中。感官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富于想象,寻求变化,自主而不顺从,但这未必就对应于一种被称为“开放性”的人格特质。我们“看到”小白鼠在迷津中成功地第n次“拐弯”,但这也未必就是所谓的学习。从对具体的感觉直观出发,然后将之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往往只能在自然认识论的物相水平上把握对象。这是一种“平面的、没有深度的,立足于人的五官感觉的生物学和生理学层面” (邓晓芒, 2006, 第46页) 的对对象的现成性把握。心理存在不是直观的作为自然对象的物 (Ding),而是作为客观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诸如动机、人格、情绪情感,以至记忆、注意、学习都是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但正因其非直观性,在具体研究中它们都被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或其较为复杂的进化阶段而现成性地把握了。心理学现在要面对的正是感官无法直接把握的作为客观抽象的关系与功能性属性,而不是直观的物质实体。但在很多心理学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对人的感性直观的迷恋,热衷于将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处理成孤立的感觉实体,然后从其看得见的现象中抽取或归纳出这一实体看不见的本质特征。这就是传统心理学研究经验抽象方法论,即从感觉具体到理论抽象的理路。这里存在着一个心理学家的狡计:基于对可见变量的操作获得的某种量值被直接等同于不可见的作为客观抽象的关系性质 (王波, 2015a, 第26页)。例如在小白鼠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中,将其在迷津中的第N次成功“拐弯”的可视性感官经验,直接等同于“学习”这一范畴。这就是种族幻象的心理学表现。

在对感觉的盲目崇拜之外,培根还指出了种族幻象的另外一种心理倾向:只关注应验了的事物,而对失败的则选择忽视。培根认为人天生就存在一种痴念 (wishful thinking),即自然地倾向于接受、相信甚至是证明自己自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和原则。人类理智一旦接受了某种意见,往往就会将其他一切都用来证明或支持这种意见,而对于现实存在的有力反证,人或是选择视而不见,或是通过某种分别将之置于一边而加以拒绝 (Bacon, 1863, p.2)。心理学中的“发表偏倚 (publication bias)”正体现了这样一种心理倾向。虽然历经数年的讨论和争辩,心理学中的“发表偏倚”依旧是一个难以解决

的问题。发表偏倚是指数据分析具有显著性的研究结果比起非显著性的结果更易发表 (Rothstein & Bushman, 2012, p.129) 的现象。它又被称作“文件抽屉问题” (the file drawer problem), 喻指那些非显著性的研究结果被放在文件抽屉中不被发表亦不为人知 (Rosenthal, 1979)。论文发表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发表偏倚的产生。审稿人和编辑可能对得出了阳性结果的研究更加青睐, 而将报告阴性结果的研究无情地退稿 (de Bruin, Treccani & Della, 2015)。在发表偏倚的影响下, 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证明了实验假设的成功研究, 而那些虽然失败却可能对心理学极有意义的研究却难为人知。正如在心理学史的研究中, 传统的史学家对心理学的失败几乎毫无兴趣, 他们往往只关注这个学科的成功之处 (Teo, 2005, p.1)。由此心理学的发展就变成一种线性的、平滑的、同质性的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的同一性材料的堆积。然而实际上, 心理学的历史演进并非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是一个从无到有, 从有到多的线性发展过程, 而是充满了沟壑、空白与沉默。但在只关注成功的辉煌史观的视阈中, 这些异质性的声音基本都被遮蔽了。正如培根四个世纪之前所说, 意识到人认知的缺陷是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心理学家需要对自己的研究实践保持开放的反思性, 在多声部和多视角的复调话语中超越作为种族幻象表现的主观的伪同一性叙事, 才能真正提高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

二、洞穴幻象

种族幻象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集体假象。洞穴幻象与之不同, 它是一种后天产生的、具有文化特性的个人假象。培根认为, 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洞穴”, 正是这种洞穴的作用和影响, 使得“自然之光发生折射和变色” (Bacon, 1863, p.1), 以致于我们难以接触事物的本质, 看到真实的世界。个体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社会阶层不同, 受到的教育、习惯和偶然因素的影响各有差异。在个体差异的基础上, 每个人都会存在其特有的偏见和信念, 进而导致其精神各不相同, 而且变幻不定 (同上, p.1)。由此就导致了个体的洞穴幻象。这种特殊且个别的偏见, 人人存在, 但却各有不同, 表现为个别研究者所特有的私人成见 (罗素, 2005, 第 75 页)。培根指出, 洞穴幻象大部分产生于几种情况: “或则先有一个心爱的题目占着优势, 或则在进行比较或区分时有着过度的趋势, 或则对于特定的年代有所偏爱, 或则所思辨的对象有偏广偏细之病”。培根由此提醒科学研究者, “凡从事于自然研究的人都请把这样一句话当作一条规则: ——凡是你心所占注而特感满意者就该予以怀疑” (培根, 1984, 第 31—32 页)。

当前的心理学研究中往往存在着对某种新颖的研究方法或“心爱的题目”的偏好, 以及对心理学领域新的研究风潮的追捧。比如“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就是这样一种“心所占注而特感满意者”。镜像神经元是一种存在于灵长类物种中的 (Rizzolatti & Fadiga, 1999) 特殊的神经元系统。无论是个体自身执行动作, 还是观察到其他个体执行相同的动作时, 这类神经元均会放电 (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 亦即镜像神经元可以通过对其他个体行为的“镜化”处理, 使主体体验到相同的感受、作出相同的情感反应。这一神经元系统自发现以来, 愈发成为心理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研究焦点, 镜像神经元理论也备受相关领域研究者的赞誉和偏爱。美国著名认知神经科学家拉马钱德兰 (Ramachandran) 甚至将其提高到心理学学科基础的地位, 预言镜像神经元对心理学的意义, 犹如 DNA 在生物学中的作用。它将提供一种统一的架构, 并有助于解释许多至今仍困扰着心理学家, 而且难以进行实验检验的心理能力问题 (Ramachandran, 2010)。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镜像神经元理论渗透到心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层次, 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结论。镜像神经元被认为是人类自我意识, 是预测其他个体后续行为和潜在意图的神经基础。它提

供了一种人类观念与行为联结的心理机制 (Keyesers, 2011), 并且与人类的语言能力、自动模仿、移情、自闭症都具有紧密联系。镜像神经元研究呈现出了一种井喷式发展, 成为认知科学领域中的一种风潮和标杆。

但是与此同时, 镜像神经元理论似乎也被许多研究者“神化”了。这一理论成为通约心理学研究的普适原则, 仿佛所有的人类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都可以在该理论中找到支撑。镜像神经元在市场营销中都可以发挥作用, 它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消费者行为的了解, 还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广告过程的认知 (Lacoste-Badie & Droulers, 2014, p.195)。镜像神经元理论仿佛成为研究者手中的“魔法棒”, 挥一挥手就可以通过“镜像”穿透一切事物虚妄的表象, 直指其核心, 抓住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方面。在“镜像神经元神话”的迷思中, 心理似乎只是不同脑区神经元控制下的“提线木偶”。它仅被看作是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一种更复杂的表现方式。由此心理就被处理成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具有内在固有属性的自然对象, 那么所得出的必然也是经验主义拜“物”教的结论 (王波, 2015a, 第25页)。镜像神经元或可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但它绝不可能提供一种普遍的最终解释。心理学要提高自己的科学性, 就要警惕对某种既定心理学理论或方法“神话式”的崇拜, 对“心所占注而特感满意者予以怀疑”。否则这样一种对可见的“物”的神话式的迷恋, 不免使心理学研究陷入洞穴幻象的泥沼之中。

无独有偶, 上个世纪“脑的十年”余热犹在 (王书荣, 1990, 第68页), 2013年4月, 美国总统奥巴马又推出了新的脑研究计划。该计划全名为“通过推动创新性神经技术进行脑研究 (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 BRAIN)”。迄今包括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开始了自己的脑研究计划, 掀起了脑科学研究的新一轮全球热潮。但是现有的脑科学研究基础真的足以支撑大型的脑研究计划吗? 霍根对此提出了质疑: 在我们还不了解神经编码 (Neural Code) 的方式时, 这些新的大型脑研究计划真的有意义吗 (Horgan, 2013)? 锡尔甚至直言: 欧盟的人类脑计划 (Human Brain Project) 走错了方向 (Theil, 2015)。尽管我们对于人脑工作过程的了解还很有限 (Andrew, 1995, pp.54—57), 但对脑科学研究的热情追逐和竭力探索似乎从未减弱。培根指出: 有些人留恋于某种特定科学和思索, 这或则由于他们幻想自己就此成为有关的著作家和发明家, 或则由于他们曾在那些东西上面下过最大的苦工, 因而对它们有了极深的习惯 (培根, 1984, 第29页)。而正是心理学家们对可见的“物”及作为其典型表现的脑科学的长期“留恋”和执着, 使其成为心理学研究中的另外一种“心所占注而特感满意者”。

三、市场幻象

市场幻象是在人们彼此交往、互通信息的活动中产生的假象 (Bacon, 1863, p.1)。这一假象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互动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在互动中, 不仅用语不当会阻碍准确理解, 而且语词也天然具有多义性, 容易导致对信息的增补、减少和重构, 从而造成理解—解释上的混乱, 市场幻象也就由此产生了。培根认为, 尽管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智能正确地使用语词, 但语词显然是强制和统治人的理智的, 它使一切陷于混乱, 并且使人陷于无数空洞的争辩和无聊的幻想 (同上, p.5)。语词使理解产生假象的情况有两种: 它们或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名称, 这些名称是由于幻觉的假设而产生的, 在实际上并没有与之相应的事物; 或是存在的事物的错误、模糊、误导性的名称 (同上, p.5)。市场幻象便是这样一种关乎语言虐制人心, 心意难摆除话语的幻象 (罗素, 2005, 第75页)。

首先, 科学的思维要求清晰性, 清晰性与专业术语的准确使用密不可分。在心理学与精神病学领域中, “清晰”尤为重要, 因为在这些领域中, 许多概念都具有开放性和多义性。例如情绪、人格

特质、精神失常等。开放性概念 (open concepts) 的特征是边界模糊,外延广泛,内在本质混乱不清 (Meehl, 1986)。受此影响,在心理学领域中,术语的不准确使用极易导致研究者的困惑和误解,心理学研究也可能就此陷入市场幻象带来的混乱之中。一直以来,心理学都在专业术语带来的问题中苦苦挣扎 (Stanovich, 2012)。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总有研究者会为旧概念发明新名称,他们喜欢“重新发明车轮” (rediscovering the wheel),给研究过的事物贴上新的、特殊性的标签,来显示自己研究的特别和有效 (Miller, 1999, p.150)。如此一来,必然形成心理学概念的混乱,导致研究结论在理解上的困惑,阻碍心理学的发展。以广被接受的“情商” (Emotional Quotient) 这一概念为例,如果我们对其生成的历史脉络进行考据,就会发现它可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概念或范畴。随着1996年葛尔曼 (Daniel Goleman) 的《情感智力》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从而引发了“情商”研究的热潮。虽然葛尔曼在书中通篇没有用过EQ或情感智力商数概念,他甚至还怀疑将来能否编制出像传统智力测验一样用纸笔的情感智力测验测得情感智商 (曾性初, 1999, 第37页)。但是“情商”这一概念已经广泛应用到各类心理学研究之中,同时也已经被普通大众所接受。至此“情商”代替“情绪智力”成为新的心理学概念。但在接踵而至的各种情商著作中,几乎没有建立关于“情商”的精心编制的标准化测验,更没有常模及求得情感智商的方法。随着“情商”的滥用,一系列与“商”有关的心理学测量标准被创造出来,如健商 (Health Quotient)、速商 (Speed Quotient)、灵商 (Spiritual Quotient) 以及乐商 (Optimistic Quotient) 等等。这些概念既没有明确的心理学内涵和边界,又没有相应的科学标准的测验和常模,不仅误导了部分心理学研究,甚至沦为伪心理学的欺骗手段。

其次,英国著名学者奥斯汀 (J. L. Austin) 在其《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曾提出了记述 (constative) 和展演 (performative) 两种话语。我们通常意义上使用语言就是为了陈述或描述某种事态,因此我们语言的内容是可以和现实相对照,并判断真假的。传统哲学家和语法学家所重视的就是语言的这种描述功能。当前的心理学理论研究也是一样,心理学家使用语言只是借助语言的记述性功能,而忽视了语言的展演功能对心理学的重大意义。心理学常常将概念直接等同于对象、在概念之间建立经验论的因果关系。但实际上,这遮蔽了现实生活中的真正过程。从语言的展演功能看,发出话语就是实施一种行为 (奥斯汀, 2012, 第5页),话语不再是中性的对某种对象的描述,而是代表着它要塑造的某种生活方式。正如我们在研究心理弹性时,它已不仅是对所谓的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积极态度这种心理的描述。实际上,它表现了充满风险的新自由主义对心理人抗压耐挫素质的内在要求 (王波, 2014, 第142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正是它自己生产出来的。所谓的心理弹性研究已经预设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实施一种具有弹性的行为的要求。同样地,米尔格拉姆从众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则暗示了我们在行动中要注意避免权威和社会角色对我们的影响。

最后,心理学一直强调自己作为实验科学的地位,为了凸显自身的科学性,心理学引入了许多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概念。“力”就是其中之一,并由此产生了心理学中的智力、抗逆力、创造力、自制力等“力”的概念的广泛研究和应用。自经典力学理论建立以来,关于力这个简单事实的默认假设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了,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认为它们是理所应当的。但“力”持续被使用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精神上的惯性而已 (Wilczek, 2004, p.12)。在分析力学的框架内,力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当作为心理学家的榜样的物理学家已经在将视野转向了充满不确定性的“薛定谔的猫”时,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学家却仍然沉溺于对决定论的“巴甫洛夫的狗”的自满中。心理学对诸如“力”这样的自然科学概念的无批判的挪用,有可能导致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本质方面的错误理解,由此将心理学重新带入到市场幻象的迷雾之中。

四、剧场幻象

剧场幻象又被称为“体系的假象”。它不是天赋的,而是从哲学体系的剧本和错误的证明规则印入到人心之中的(Bacon, 1863, p.6)。我们平时熟悉的各种哲学体系,究其极而言不过是舞台上的剧情,其所代表的世界可能只是哲学家自己的某种建构,和真实的世界相差甚远(杜兰,1980)。当然剧场幻象不仅限于哲学体系之中,任何一种思想系统、意识形态都可能造成这种假象。一切流行的体系都只是舞台上的戏剧,用虚构的布景方式去表现它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Bacon, 1863, p.2)。当我们不加批判地盲目接受某种思想体系,把它看作是唯一的权威和教条,甚至是获得事物本质的至高准则时,我们就进入了这一体系所构建的“剧场”之中,把在剧场中看到的“表演”当成是真正的知识。因此一旦陷入到剧场幻象之中,我们就难以窥见理解的秘密从而掌握真理(同上, p.6)。正如法国学者贝尔纳所说:我们学习的最大障碍往往来自自己知的东西,而非未知之物。

在心理学领域,未尝不存在着主流思想所营造的“剧场幻象”。现代心理学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坚持宣称心理科学的客观性、可靠性和价值中立,也因此确立了实证主义在心理学叙事逻辑中的支配地位。实证取向作为心理学的三大研究传统之一,在目前的心理学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王波, 2015b, 第104页),甚至一度左右着心理学的发展方向。作为实证主义创始人的孔德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与基础,科学所讨论的只是经验现象范围以内的事情(夏基松, 2009, 第20页)。而这便为因其“科学性”而常受质疑的心理学找到了一条通往科学圣地的道路:将不可见的心理过程转化为可以通过实验获得的客观感觉经验数据(王波, 2015b, 第103页)。“假设—检验”的研究范式被主流心理学所积极接受并推广。由此人口的心理特征以编码的方式被规范化,它包括积累和总结数据,并将之平均化和常模化,然后进行比较、评价和评判,并据此决定针对它的矫正、治疗、规训、隔离、或者最优化等各种治理技术(王波, 2014, 第137页)。

随着实证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盛行,更多的心理学家将之视为获得科学研究结果的基础,是心理学提高科学性的唯一方法。在客观实证的旗号下,心理学家盲目接受经验证实原则,将其当成一种不可超越的教条,并进而形成了对经验原则的崇拜(叶浩生, 1998, 第65页)。这样一种对实证主义缺乏质疑和批判的态度,以及相应而生的对其他科学哲学的冷漠,使得心理学家成为了“实证主义的信徒(the cult of empiricism)”(Toulmin & Leary, 1985, p.594)。除此之外,受实证主义影响,心理学对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过分崇拜,不仅形成了明显的“方法论中心主义”倾向,而且导致了理论研究的匮乏和贫困:凡不能以经验证实的理论探讨皆被视为是伪科学的,理论成为一种累赘的、缺乏科学信度的“形而上学”(叶浩生, 1998, 第65页)。而只有秉承了西方传统科学观念,坚持使用将心理现象量化的方法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客观的、真实的(Mitchell, 2003),否则就只被看作是徒劳无功的、纯粹思辨的“摇椅上的心理学(Armchair Psychology)”。

实证主义片面夸大了可证实性和客观性在科学中的作用,把两者作为科学研究中的唯一的至上的目标。而在心理学中,若将实证主义视为心理学研究的至高准则,一旦遭遇“可重复危机(replication crisis)”,就会动摇心理学的科学性基石。心理学研究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来源于大量的重复试验与实验结果的普适性(Breen & Darlaston-Jones, 2010, p.68)。但是近年来“可重复危机”已经开始在逐渐围困各种科学研究。在医学、心理学、基因研究和生物学领域内,都面临着失败的重复研究(Schooler, 2014, p.9)的窘境。而在心理学中最近广泛讨论的“重复性危机”之下,心理学家对于该领域内的研究结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疑(Pashler & Wagenmakers, 2012, p.528),由此导致了心理学的

信任危机,使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心理学的边界,即其得以成立的前提与界限。所以这也可能正是一个关键的契机,心理学家或许可以由此走出实证主义的“剧场”,认识到作为其他可能选择的新的心理学方法论工具或思想框架,从而实现心理学研究的突破乃至革命性进展。

至此我们已经梳理了存在于心理学研究中的四种幻象。借助于对这四种幻象的清理,我们得以将心理学从对自己的研究的中介性无思的状态带入自我省察的领域,重新思考心理学知识生产的边界问题,追问心理和心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与界限。如果说由于传统心理学置身于现存社会据以再生产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故而这一问题对传统心理学来说似乎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的话,那么作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培根则从科学内部为我们撬开了一条缝隙,从而使我们的关于心理学的想象力藉由此处重新超逸而出。

参考文献:

- [英] 奥斯汀, 2012:《如何以言行事——1955年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讲座》, 杨玉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邓晓芒, 2006:《对“价值”本质的一种现象学思考》,《学术月刊》第7期。
- [美] 杜兰, 1980:《西洋哲学故事》, 陈文林译, 台北:台湾志文出版社。
- [法] 福柯, 2001:《词与物》, 莫伟民译, 上海:三联书店。
- [德] 康德, 2004:《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美] 库恩, 2003:《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英] 罗素, 2005:《西方哲学史(下册)》, 马元德译, 台北:左岸文化。
- [德] 马克思、恩格斯, 1958:《神圣家族, 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北京:人民出版社。
- [英] 培根, 1984:《新工具》, 许宝骙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波, 2011:《批判立场的理论心理学》,《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
- 王波, 2014:《心理学、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治理》,《国外社会科学》第5期。
- 王波, 2015a:《资本时代“心理一般”的方法论批判》,《哲学研究》第11期。
- 王波, 2015b:《实证的、解释的和批判的:心理学研究的三大传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王书荣, 1990:《90年代是“脑的十年”》,《生物科学信息》第2期。
- 夏基松, 2009,《现代西方哲学(第二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叶浩生, 1998:《实证主义的衰落与理论主义的复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曾性初, 1999:《情智与情商》,《教育研究》第3期。
- Andrew, A. M., 1995, “The decade of the brain—some comments”, *Kybernetes*, vol.24, pp.54—57.
- Bacon, F., 1863, “The New Organon” Book 1, In J. Spending, R. L. Ellis & D. D. Heath (eds.),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vol.8, Boston: Taggard and Thompson.
- Breen, L. J. & D. Darlaston-Jones, 2010, “Moving beyond the enduring dominance of positivism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y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Psychologist*, vol.45, no.1, pp.67—76.
- de Bruin, A., B. Treccani & S. D. Sala, 2015, “Cognitive advantage in bilingualism: An example of publication bia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26, no.1, pp.99—107.
- Dror, I. E. & P. A. F. Fraser-Mackenzie, 2009, “Cognitive biases in human perception,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Bridging theory and the real world”, in K. Rossmo (ed.), *Criminal Investigative Failures*, Florida: CRC Press, pp.53—67.
- Horgan, J., 2013, “Do big new brain projects make sense when we don’t even know the ‘Neural Code’?”, *Scientific American*, 2016-04-03, <http://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cross-check/do-big-new-brain-projects-make-sense-when-we->

dont-even-know-the-neural-code.

Keyzers, C., 2011, *The Empathic Brain*, Amsterdam; Social Brain Press.

Lacoste-Badie, S. & O. Droulers, 2014, “Advertising memory: The power of Mirror Neuron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vol.7, no.4, pp.195—202.

Miller, N. & W. C. Pedersen, 1999, “Assessing process distinctivene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vol.10, no.2, pp.150—155.

Mitchell, J., 2003, “The quantitative imperative: Positivism, naive realism and the place of qualitative methods in psychology”, *Theory and Psychology*, vol.13, pp.5—13.

Pashler, H. & E. J. Wagenmakers, 2012,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 on replicability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A crisis of confidenc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7, pp.528—530.

Pickering, A., 1995,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machandran, V. S., “Mirror Neurons and imitation learning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human evolution”, 2016-04-02, <https://www.edge.org/conversation/mirror-neurons-and-imitation-learning-as-the-driving-force-behind-the-great-leap-forward-in-human-evolution>.

Rothstein, H. R. & B. J. Bushman, 2012, “Publication bia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Comment on Ferguson and Brannick”, *Psychological Methods*, vol.17, no.1, pp.129—136.

Rizzolatti, G. & L. Craighero, 2004, “The mirror-neuron system”,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vol.27, no.1, pp.169—192.

Schooler, J. W., 2014, “Metascience could rescue the ‘replication crisis’”, *Nature*, vol.515, no.7525, p.9.

Stanovich, K. E., 2012, *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 Boston, MA: Pearson Allyn and Bacon.

Teo, T., 2005, *The Critique of Psychology*, New York: Springer.

Theil, S., 2015, “Why the human brain project went wrong and how to fix it”, *Scientific American*, vol.313, no.4, pp.36—42.

Toulmin, S. & D. E. Leary, 1985, “The cult of empiricism in psychology, and beyond”, in S. Koch & D. E. Leary (eds.), *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Wilczek, F., 2004, “Whence the force of $F=ma$? I: Culture shock”, *Physics Today*, vol.57, no.10, pp.11—12.

(责任编辑:蒋永华)

Francis Bacon’s Theory of Four Idols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Psychological Studies

WANG Bo

Abstract: Francis Bacon pointed out the existence of four idols, namely: Idols of the Tribe, Idols of the Cave, Idols of the Marketplace, and Idols of the Theater. They are the prejudices of the people who incline to ignorance and error, and are the major obstacles to the truth. We find that these four idols still have some influence on the studies of modern psychology. Bacon is called the real originator of modern experimental sciences as a whole. His theory of four idols still provides a usefu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sychology which identifies itself as science.

Key words: Francis Bacon; four idols; methodology; mediated-ness; theoretical psychology